



超越“扩散模式”

——新时代边疆研究的理论探索

[文章编号]1001-5558(2025)06-0054-05

●王娟

一、作为社会科学概念的“边疆”

日常用语中的“边疆”往往被视为一个地理概念，在中文语境中与“内地”相对。被誉为“边疆研究之父”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Turner）于1893年发表了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从“边疆”的扩展和演变历程的角度对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由此开创了美国史研究的“边疆学派”。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特纳写道：“在美洲发现四百年和宪法公布一百年后的今天，边疆已经消失了。”^{[1] 38}这个论断清晰地表明：在特纳的定义中，与“中心”相区分的“边疆”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前的政治生态中特有的现象；而当民族—国家建设已经完成，其领土范围内实现了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社会文化和国民身份的“同一化”，也就不再有所谓的“中心”与“边缘”之别了。

因此，社会科学的边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历史上“中心—边缘”关系的研究。尤其在过去几十年，在对民族—国家叙事的反思中，西方出现了“王朝研究”的复兴，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估大一统王朝以“差异政治”为核心特征的统治体系及其价值^{[2] 11-15}，而作为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边疆”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关于中国王朝时期的“中心—边缘”关系，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一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两种模式。第一种可称为“中原化模式”，即以皇帝制度、郡县制、编户齐民制为骨架的“中原体制”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山地逐渐扩

[定稿日期] 2025-09-03

[作者简介] 王娟，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西北民族研究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2025年第6期(总第135期)

2025.No.6(Total No.135)

展。这是一个“中心”不断拓展、“边疆”日益收缩的过程。第二种可称为“长城模式”，即建立在精耕农业基础上的中原体制与建立在游牧基础上的北方草原政权沿长城展开的长期互动。这是一个二者在战争与和平、竞争与互补中持续互动、逐渐融合的过程。两种模式共同阐释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脉络。

上述两种模式都是在王朝的政治体制和前工业化的技术背景下形成、发展和延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一体化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已经不存在“差异政治”意义上与“中心”相区别的“边疆”了。

二、工业化国家的“中心—边缘”关系

正如特纳的论断所暗示的，现代民族—国家只有地理意义上的“边境地带”，而没有政治、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边疆”。然而，所谓“民族—国家建设”是一个长久的过程。现代国家可以在理念和制度上消除国境内的“差异政治”，却并不能一蹴而就地消除区域差异。事实上，任何幅员辽阔的国家，都存在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这一差异建立在自然生态、历史传统和居民的文化认同之上，因此即使在一个政治一体化的现代国家中，往往也存在经济与文化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之别。

在现代国家的语境中，这一差别可能采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当代中国，常常被表述为“东部”与“西部”；这一划分并非完全的地理分区，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分区。事实上，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部”不仅包含位于中国版图西部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还涵盖地理上不属于“西部”的延边、恩施、湘西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显然，这里的“西部”是一个经济与政治生态的概念。

那么，在现代国家的政治架构与工业化进程中，由自然生态和历史遗留所形成的经济与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边缘”关系将如何演变呢？

关于这一问题，社会科学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理论模型是所谓的“扩散模式”。该理论模型认为：在前工业化时期，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因距离、地形等原因而隔绝，二者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许多差异；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种隔绝将被打破，核心地区的社会结构类型将扩散到边缘地区，从而推动边缘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形式的更新。从长远来看，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维持各自独特的社会结构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会消失，二者趋于同质化^{[3] 6-8}。

“扩散模式”描绘的是一条工业化推动民族—国家建设的理想路径，能够解释许多国家的边疆整合进程。然而，这一理论模型产生于19世纪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时期，带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和浓厚的发展主义倾向。它预设了一条单一的、抽象的现代化路径，既否定了多元现代化的可能性，也低估了一个地区的自然生态、历史传统、文化形态对该地区的发展模式所具有的长久影响力。

三、超越“扩散模式”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心—边缘”关系的研究中，“扩散模式”是应用最广泛的理论模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进程似乎符合“扩散模式”的分析和预期。然而，由于前述缺陷，这一过度简单化的模型也系统地忽视了中国边疆发展模式一些重要的、值得关注的特点。

以下三个问题及相关案例可以为超越“扩散模式”、探究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一些启发。

问题一：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模式是否完全是东部地区“先进模式”的扩散？西部地区是否在某些领域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东部地区但同样是“现代的”模式或路径？

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为例，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点设定为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代表，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的“过密化”小农经济，从而将过去四十年所兴起的各种新型经营模式视为在这一基础上的改革探索；同时，西部地区的农业经营模式变迁则被视为东部模式的扩散。然而，只要客观地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农业发展史，我们就不能忽略，除上述从发达的“小农经济”演化而来，仍带有各种“小农”遗存的经营模式外，在中国的农业版图上，还存在另一种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伊始就以规模化、机械化为特征的农业生产模式，即以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为代表的农垦体系，被称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国家队”，其在保障中国的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4] 12-13}。

我国农垦体系规模最大的地区是东北的黑龙江和西北的新疆。这两个省区能够发展起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既与它们地势平坦的自然地理特征有关，也与它们作为前边疆地区人口密度低、旧制度基础薄弱，因此更容易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有关。这种农业经营模式建立在与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传统农业发达地区不同的社会基础之上。

农垦体系发端于中国工业化初期的计划经济时期。今天，在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市场化的背景下，西部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再次发展出不同于东部地区的经营模式，这主要体现为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和由长距离流动的农业雇工构成的农业劳动力市场。这种模式不是东部省份“先进模式”的扩散，而是在西部省份的自然条件、人地结构的基础上，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西部模式”^[5]。

问题二：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对“发展”的含义和方式都有了更多元的理解，中国也相继提出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理念。在这一背景下，“中心—边缘”关系是否会增加一些新的维度？占据某个地理空间的区域（尤其是历史上的边疆地区）在国家战略版图上的位置和角色是否会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将如何影响该区域的发展模式？

以内蒙古地区为例。从17世纪到21世纪，作为典型的“边疆”，内蒙古地区不仅经

历了不同的政权，建立过不同的行政单元，而且在国家战略版图上的角色也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变化。

在清朝初期的政治建构中，蒙古部落的贵族被定位为皇室的政治盟友，蒙古高原则成为北疆的军事屏障；而在财税的意义上，这一地区几乎不具备经济价值。

从清朝中期开始，在保留前述角色的基础上，内蒙古地区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财税化”过程。该过程与当地的农业开发相伴展开。从康熙年间起，为筹措征战准噶尔的军费，清中央政府开始在今呼和浩特一带推动农业开发；至清末，在边疆危机和财政匮乏的背景下，垦务在内蒙古地区得以大规模推行。农业开发促使大量内地人口流入内蒙古地区，推动了当地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被开垦的土地纳入统一的财税体系中，使这一地区开始与内地省县一样，成为清中央政府的财税来源。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地区转变为与其他地区相同的行政单元，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农业税和牧业税标准。在工业化建设时期，与其他地区的农村地区一样，内蒙古的农牧区承担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剪刀差”，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述历程似乎符合“扩散模式”的路径，内蒙古地区从王朝时期地方政权下的“边疆”逐渐转变为现代国家统一政体下的地方行政单元，并在发展模式上与内地日益趋同。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调整，在国家对内蒙古地区的战略定位中，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超越了经济发展。2023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将把内蒙古建设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列为内蒙古自治区“五大任务”之首。内蒙古地区依然承担着“畜牧业基地”“能源基地”的重要角色，但这两个带有较强经济属性的角色，从属于作为国家“生态屏障”的角色。“生态”作为红线，成为具有最强约束力的力量。

内蒙古地区的“生态优先”定位是更大范围的科学发展观的一部分。当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突破单纯的GDP指标后，国家战略的维度更趋多元，不同地区在国家战略版图上的位置也将发生变化。事实上，中国西部的许多地区都承担着生态涵养地的重要角色，而这显然超越了“扩散模式”的发展主义预设。

问题三：在工业化时代，与“中心”的地理距离是“扩散”最大的障碍；而在后工业化时代，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极大地削弱了这一障碍，而且在某些领域重塑了个体对不同地理空间的认知。这种由新技术带来的空间感的变化，会对传统认知中的“中心—边缘”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最引人入胜的例子是“数字游民”群体的出现。“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尚未形成严谨的社会科学定义，大致指那些借助互联网技术远程工作，无需固定办公场所，因而能够实现地理自由的一类人。该群体多从事软件开发、内容创作、设计等创造性工作，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互联网上引起大量关注，是因为他们常常通过“地理套利”选择低成本地区生活以优化收支结构。而在中国的场景中，这类低成本地区往往是所谓的“边疆地区”，其中云南更因其优越的气候条件而成为中国“数字游民”最集中

的地区。

我们很难预计“数字游民”及其所采取的劳动和生活方式是否会发展为一种在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现象,但该现象在大众媒体上受到的追捧,至少显示了普通民众对中国各地区(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地区)的认知的变化。

四、小 结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边疆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亦是回答“何为中国”“何以中国”等重要问题的基石。既有研究成果更多集中于历史时期的边疆形态和演进机制的讨论,而对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的边疆发展模式及“中心—边缘”关系的研究尚不充分。

本文第三小节提出的问题和案例都来自最近几年的经验观察,可以为超越“扩散模式”的思维定式提供一些启发。对新时代“中心—边缘”关系模式的探究,不仅是推动边疆研究理论创新、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也是回应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求、提升国家边疆治理能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 [1] TURNER 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M]. New York: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 [2] 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M].柴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3] HECHTER M.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4] 王曙光.中国农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安全的中国道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5] 王娟.工业化背景下农业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基于对农牧交错地带农业转型的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25(3).

(责任编辑:王国军;专业编辑:哈 德)